

風塵僕僕徙置區

任澤民神父

瑪利諾修會



Rev. John A. Cioppa, M.M.

生活本身就是探索，是一個旅程，
是一個永不止息的交談及成長。
生活最好是不要斤斤計較於尋找答案，
而是好好地活出每一日的探索。

第二章 風塵僕僕徙置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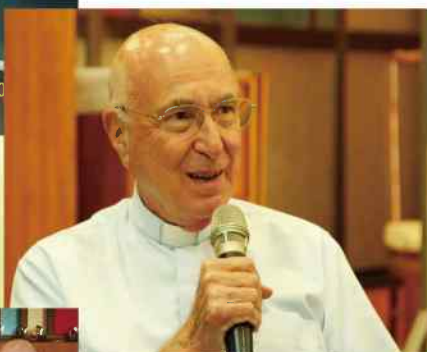
瑪利諾修會任澤民神父

(Rev. John A. Cioppa, M.M.)	81
(一) 《澤心民語》道盡驚喜和感恩	83
(二) 瑪利諾修會和香港結下不解之緣	87
(三) 踏上陽光燦爛的香港島	94
(四) 會長給我一個新挑戰	99
(五) 瑪利諾修會因應時代需要	102
(六) 也許我永遠也不會明白	104
(七) 我從沒有刻意要求過甚麼	107
(八) 參與聖神.究中心行政工作	109
(九) 見證了香港的成長	111

瑪利諾修會 任澤民神父
Rev. John A. Cioppa, M.M.



任澤民神父效法基督謙卑精神，
為門徒濯足。



任神父常常帶著感恩不盡的親切笑容。



任神父灑聖水降福兒童。



任神父在從置區為平民服務，樂此不疲。



聖博德天主堂及小學在橫頭磡徙置區有五十多年歷史
(圖片由聖博德堂教友提供)

(一) 《澤心民語》道盡驚喜和感恩

2013年11月抵達香港時，承蒙資深作家李韡玲邀請我到半島酒店茶聚，我們雖然素未謀面，但她非常慷慨，熱誠贊許我這項訪問寫書的計劃，並且為我提供了許多寶貴和實用的意見。李韡玲知道我離開了香港許多年，而我要採訪的，都是在1960年代已經在香港開始工作的傳教士，在實際程序上，肯定會面對不少困難，不僅因為目前在香港住上超過五十年而仍然留下的傳教士為數不多，而可以抽空跟一個陌生人毫不保留地敘述一生事蹟的，更少之又少。

臨行前，李韡玲很爽快地答應我，她會盡力在她相熟的神父中，找些適合人選來做些推介，美國瑪利諾傳教會的任澤民神父(Rev. John A. Cioppa, M.M.)就是其中她最熟識的一位。

留港期間，幸得大學同學和大專聯會的好友陳子良夫婦慷慨接待，一切訪問安排得非常緊湊，諸事進行順遂之餘，我甚至忘記了原來Ling姐（李韡玲）一直都在背後堅守著她的承諾。她在百忙之中，不斷抽

空做聯絡工作，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她由始至終的熱誠和幫忙。

1974年移民之前，我和家人都住在橫頭磡，當時聖博德天主堂(St. Patrick's Parish)^{註一}一直由瑪利諾傳教會的神父管理(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又稱Maryknoll Fathers或M.M.)，我熟識的本堂神父，除了謙謙君子的謝鳴之神父外，還有兩位從美國來的：一位是莫若翰神父(Rev. Juan B. de Morales, M.M.)，另一位是區成賢神父(Rev. Francis G. Elsinger, M.M.)，都很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974年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後，有一天母親突然來信告訴我希望領洗入教，我匆匆聯絡過聖博德堂之後，區成賢神父知道我母親在橫頭磡做小商店生意，很難抽身去聽道理，便親自「上門授課」，可惜僅僅去過兩次，母親就因為要入醫院做手術，而且不到半天，便突然逝世。這年我身在海外，百感交集，非常遺憾，但區神父安慰我說：不用遺憾，這是「願洗」！^{註二}

所以，我特別感激橫頭磡的瑪利諾修會神父。

可能因為這種個人理由，我在計劃中希望首先訪問橫頭磡瑪利諾修會的神父，但從加拿大發過兩三次

電郵，聯絡過他們的總會院，卻沒有消息，恐怕時間不足，就放棄了。

有一天，上午我做完訪問，從尖沙咀回到青衣友人家裡，準備整理筆記和錄音，友人在餐桌上給我放置了幾本參考書，其中一本最引起我興趣的，是任澤民神父的《澤心民語》。^{註三}

我雖然不太熟識任神父，但隨意翻看了幾頁，便立即被他許多點滴故事和講道所感動，在我心中，不期然燃起了追訪他的願望，在這書的後頁，附印了橫頭磡聖博德堂區的電話號碼，我就隨即打去，給堂區秘書留下口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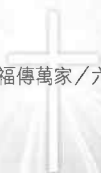
第二天，任澤民神父果然給我回了電話，並答應當天下午接見我，原來他剛從美國回來不久，而好友李韡玲已經跟他聯絡過。

《澤心民語》這本書，其實是橫頭磡聖博德堂區一批熱心教友，將任神父從1999年到2009年在堂區通訊裡所寫的書信、講道及文章結集成書，作為祝賀他晉鐸五十週年的禮物，這實在是一份兼具創意和愛心，又可以留芳百世的最佳紀念品。任神父一生不斷感恩，不斷對新事物表達謙虛和詫異，神父堅定的意志，傳教的熱誠，對瑪利諾會長的聽命和忠心，處處

流露著真、善、美，不但令人感佩，也令人讚賞天主的大能。

我相信凡看過《澤心民語》這書的人，都會愛不釋手，對這位誠懇謙卑，笑容可掬，與香港同行了五十五年的傳教士，一定會不斷的感謝天主。

我非常期待跟Father Cioppa見面。



(二) 瑪利諾修會和香港結下不解之緣

有關傳教士的活動，中國早期已經有不少記載，但他們大都是從法國、愛爾蘭、英國、德國等地來的；從美國來的，瑪利諾修會算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近年的傳教事業中，瑪利諾修會是年紀最輕而又最活躍的一個。

瑪利諾修會原名為美國天主教外方傳教會(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該會創立時，由來自美國波士頓的華爾實(Rev. James Anthony Walsh, 1867-1936)和來自北卡羅來納的普瑞斯(Rev. Thomas Frederick Price, 1860-1919)兩位神父，一起在美國紐約州西徹斯特(Westchester)開始。

瑪利諾修會創會的宗旨，是回應社會及傳教區的需要，到海外為急需救濟的窮人和難民服務，藉此傳揚福音。

1917年，創會人之普瑞斯神父(Rev. Thomas Price, M.M., 1860-1919)接到廣州光若翰主教的邀請(Bishop Jean-Marie de Guebriant, MEP)，到廣東省沿岸協

助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工作，自此之後，瑪利諾修會就和香港教區結下不解之緣，在教育、醫療及服務難民方面，貢獻良多。

1918年10月，第一批率先到達香港的瑪利諾神父，包括普瑞斯(Rev. Thomas Frederick Price)及馬奕猷(Rev. Bernard F. Meyer)兩位。不久，華理柱(Rev. James Edward Walsh)及福爾德神父(Rev. Francis Xavier Ford)也跟隨而來，這四位神父不但在中國和香港播下了信德的種子，也啓發了許多美國青年到中國來的熱誠。

1. 普瑞斯神父(Rev. Thomas Frederick Price, 1860-1919)

普瑞斯神父是瑪利諾修會創辦人及首任會長，年輕時已經積極在報章雜誌上，推廣宣傳海外傳教工作，一次朝聖經歷，使他更強烈地感到這份心願，所以當廣州光若翰主教邀請他去中國時，歡喜若狂，可惜抵達香港不到一年，1919年染病逝世，年僅59歲。瑪利諾修會於1936年，將他的遺體從跑馬地天主教墳場，遷回美國總部安葬，普瑞斯神父的家鄉北卡羅來納教區，為普瑞斯神父進行列聖品的審查工作，期待不久的將來，香港除了方濟會真福雷永明神父(Blessed

Gabriele Allegra, OFM, 1907-1976)之外，又增加一位瑪利諾修會聖人。

2. 馬奕猷神父(Rev. Bernard Meyer, 1891 - 1975)

馬奕猷神父於1919年到了中國之後，在江門及梧州開設了傳教站。馬神父一生平平無奇，但沉默的工作中見多姿多采，充份表現了一位真正傳教士的毅力和熱誠。馬奕猷神父很有語言和寫作天才，爲了方便自己及其他會士學中文，他編著了一本袖珍漢英詞典，退休返美後，又出版了十多種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馬神父自願投入本港一個集中營裡工作，營裡不少人都受到了他的潛移默化，鼓起生存下去的勇氣。

1945年8月，日本戰敗，香港重光後，馬奕猷神父曾經創立一個和平軍人俱樂部(St. Nicholas Club)，讓軍人可以濟濟一堂，共度歡樂時光，以免淪於惡習。接著，馬奕猷神父又再次前往中國大陸傳教，一個名爲「天主教長青家園」的網站中，作者 Kuta 寫了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還展示許多珍貴照片，其中一張攝於1948年，馬奕猷神父在廣州路邊行醫施藥。

馬奕猷神父退休返美後，雖然健康漸漸退步，但

精神卻越來越抖擻，對傳教牧民工作的熱誠，絲毫未減，並繼續寫作。

1975年5月8日，馬奕猷神父在紐約病逝，享壽八十四歲。

3. 華理柱主教(Rev. Bishop James Edward Walsh, 1891-1981)

華理柱神父1915年晉鐸，1918年抵達香港後，隨即轉入內地，在江門教區傳教，1927年升為主教，時年僅三十六歲。1936年，華主教被調回美國，接任第二屆瑪利諾修會總會長職位，1948年應教宗任命，再度返回中國。當時華理柱主教曾經說過一句感人肺腑的話，也代表了他深深熱愛中國的程度：^{註四}

「傳教士的任務，是要去他不想去，但需要他去的地方，直至不需要他，但需要他留下為止。」

華理柱主教為了統籌亞洲傳教工作，在上海設立傳教中心。1949年大陸易權，華神父被中共冠以「美帝間諜」罪名，受到嚴厲管束，1958年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到1970年7月10日，在毫無事前通知下，中共突然把他釋放，由香港首任中國籍主教徐誠斌，在新界羅湖邊境迎接過橋，重獲自由。





中共突然釋放華理柱主教，出獄當日，華主教由香港主教徐誠斌(右)及瑪利諾修會會長石禮民神父(左)在羅湖邊境迎接過橋。

(圖片由香港《公教報》提供)

教宗保祿六世在華理柱主教出獄後，立即寫信向他致意：

【基督摯愛的兄弟：五十年前，你偕同首批瑪利諾修會神父在教會熱愛的中國人中傳揚基督的喜訊，今日你卻要帶著更沈痛難忍的心情離開他們。我以神父的身份接你回家，並代表整個教會，感激你為福音所付出的一切代價和犧牲。願主藉這苦難與蹟，使你播下的傳教種粒，茂密生長，果實纍纍。】^{註五}

當時很多人以為中共無條件釋放華理柱主教，意味著宗教自由的開始，後來才知道，原來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正在秘密和中國總理周恩來安排尼克遜總統(Richard Nixon)1972年訪華的事，中國藉著釋放美國傳教士的信息，讓世界知道，鐵幕漸漸開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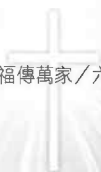
囚禁期間，中共斷絕華理柱主教與外界的接觸，更嚴禁他和外國人溝通。被釋放後，他因為體力虛弱，回美國前需要在香港作短暫療養，住在瑪利諾修會辦的黃大仙聖母醫院內，其間心態平靜，絕無半句怨言。

第一次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華理柱主教說：「教徒有難，牧者留守羊群，這是他的基本職責，區區小事，毋須大做文章。」

1981年，華理柱主教在美國瑪利諾修會總會院，以九十高齡病逝。

4. 福德主教(Rev. Bishop Francis Xavier Ford 1892-1952)

福德主教於1892年生於紐約，1912年入瑪利諾修會時，他是第一名修生。1917年晉鐸後，隨著第一批



瑪利諾修會傳教士，經香港到中國廣東省傳教，先到陽江市，後在客家梅縣服務了三十四年之後，1935年獲教宗委任為瑪利諾修會第一位主教。

1949年福德主教被中共拘捕，控以「間諜」罪名，飽受迫害。1952年2月21日死於廣州獄中，終年六十歲。

香港的涂挽靈神父(Rev. Howard Daniel Trube, M.M.,1913-1995)曾經和福德主教共同在梅縣傳教多年，所以在1953年，即福主教逝世後第二年，涂神父在九龍東頭村開辦了一所小學，名為福德學校，以紀念福德主教，這是瑪利諾修會神父在香港開辦的第一所天主教學校。

(三) 踏上陽光燦爛的香港島

任澤民神父(Rev. John A. Cioppa, M.M.)在電話裡和我約好，在橫頭磡聖博德堂見面，通傳後，任神父很客氣地親自跑到學校門口來迎接我，聖博德是我四十五年前的堂區，我們先拍兩張照片留念，一進入校監室，任神父就綻開和藹的笑容，從容地說：

「長長的故事，不如乾脆從第一天在香港登陸時說起吧。」

任神父說著，嘴角展露著當天抵達香港時的幸福和滿足，五十五年前的往事，猶如昨日。

1959年，任神父晉鐸的時候，剛剛度過了二十七歲生日，會長就派他乘船從美國紐約來到香港。

「我很清楚記得，在香港中環碼頭登岸時，一片燦爛陽光，照耀著大街小巷，我感到無比溫暖和舒適，當下就決心在這塊中國的土地上，不離不棄，跟中國人同甘共苦。

「我在香港的第一份任務，是在九龍城東頭村福德小學教英文，這是瑪利諾修會於1953年開辦的第一

所天主教學校，名為福德學校，是為了紀念當年在廣東梅縣獄中去世的瑪利諾修會福德主教。

「福德學校(Bishop Ford Memorial School)位於九龍城黃大仙區東頭村白鶴山上，校園前方原是培民村，旁邊為香港華人基督教墳場，山後為摩士公園(Morse Park)。在1959年，當我初抵香港時，正是福德學校的全盛時期，學生由早期六百名增至二千多名。

「除了在福德學校教書，我一有空，就去木屋區做探訪，居民非常親切，對我們客氣得像家人，無論爸爸媽媽或小孩子，都常常嘻嘻哈哈，教我們中文，所以那幾年，我的廣東話進步得特別快。」

福德學校的成立，經歷過不少困難，在香港天主教區歷史上，具有非凡意義，這是美國瑪利諾修會傳教士和教區群策群力的成果。

中國繼二次大戰後，又發生內戰，大批難民逃離家園，從內地湧來香港，遍佈山頭野嶺，九龍城東頭村是香港數個較大的指定難民區之一。

不幸於1951年11月，東頭村發生大火，一夜之間燒毀六千多間木屋，而香港的首任主教恩理覺(Bishop Enrico Valtorta, PIME)於9月3日逝世後，準備繼任的白英奇主教(Bishop Lawrence Bianchi, PIME)卻在海豐傳

教時，連同一批意大利籍傳教士被拘禁。被中共驅逐出境的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Archbishop Antonio Riberi)，與香港的主教公署及當時香港瑪利諾修會會長毛威林神父(Rev. William P. Mulcahy, M.M. 1903-1972)，一起商討救濟工作。

根據香港教區檔案中心網頁資料：^{註六}

【毛威林神父於1929年在美國瑪利諾修會晉鐸後，曾在廣西梧州市傳教二十年之久，直到1949年，被中共驅逐出境之後，轉到香港，仍然不遺餘力地去幫助逃港的中國難民，不久，被香港瑪利諾修會推選為長上。此後，在興建早期單層徙置大廈的設計和圖則上，毛神父亦有非常卓越的貢獻。】

毛威林神父接到黎培理總主教的委任後，立即竭盡一切人力物力，在各方面進行籌款救濟的工作，並把當時被大陸逐出香港，即將調到菲律賓的涂挽靈神父(Father Howard D. Trube, M.M. 1913-1995)，都一起挽留下來，大家同心一德，全力以赴，為香港創下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救濟紀錄，也為瑪利諾修會在香港傳教歷史上，展開輝煌的一頁。

毛神父和涂神父很快就從美國募集了大批白米、麵粉、乳酪(芝士)、罐頭豆、奶粉、餅乾、衣物、文

具和藥物等，又趕緊在東頭村為災民重建家園，搭起臨時木屋，使派發救濟品工作可以全面展開。

當時有個很有趣的分配糧食方法，為了使真正有需要的人可以直接受惠，由瑪利諾修女們在黃昏之後，分批挨戶探訪，逐家點數人頭，派「飛仔」（糧票）。第二天，家人就可以到聖堂憑券領取救濟品，有些盒子還印上「美國友人捐贈」字樣。這種上門派「飛仔」的制度，不但使一切救濟工作進行得有條有理，亦令神父修女與貧民之間，建立了一種親切和尊重的關係。筆者猶記得，每當一批身穿冗長黑袍，頭戴寬帽的「雲吞姑娘」出現時，孩子們都會興高采烈的替她們充嚮導，帶著修女在巷里中穿插往來。

任澤民神父又補充一些關於涂神父的有趣故事：

「涂挽靈神父認為中國人是吃飯的民族，麵粉和芝士實在得物無所用，他就提議從歐洲訂購一架製麵機，把一包包堆積著的麵粉，製成上海麵條，後來更僱用了些外省工人，做出熱騰騰的大饅頭，特別給孩子和老人家帶來溫飽。

「正當賑災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涂神父就想到區內孩子的教育問題，他很希望在東頭村貧民區中興建一所小學，於是首先由瑪利諾修會一位建築專家亞

爾拔修士(Brother Albert Staubli)，設計了一座多用途的組合建築物：有聖堂、學校和圖書館。圖則完成後，美國紐約紅衣主教史培曼樞(Cardinal Francis Spellman)曾在1950年訪港，知道這項計劃後，立即捐助全部建築費用，並且爲了紀念剛剛在廣東受迫害去世的福德主教，命名爲『福德中心』。

「福德小學不僅是涂挽靈神父的心血成果，也是香港教區最早期的天主教學校之一。跟著，涂神父更爲了體恤貧窮人的疾苦，又在東頭村設立醫療中心。1966年間，涂神父更因考慮到難民找不到工作的困苦，而創辦了九龍佐頓谷瑪利諾職業訓練學校。」

(四) 會長給我一個新挑戰

說起五十三年前的事，任澤民神父記憶猶新，如在昨日。

「1962年，會長就給我一項新挑戰，要我在東頭村統籌、策劃、建築及開辦一間小學，我當時只有三十歲，僅僅到了香港三年，自覺入世未深，缺乏辦學經驗，而且語言不通，是個極大的障礙，但是我就像一般年青人一樣，對一切都感到興趣，有活力，不怕失敗，不怕困難。

「初步計劃中，我們準備開設上下午學校，共四十八班，換句話說，要在短期內招收一千五百多名新生，還要聘請六十多位教職員；另一方面，又要聯絡建築師，接洽承辦建築商人，真是一件很傷腦筋的事。因為學校面積的大小，教員的數目，原則上全部靠估計，沒有先例可援，校區又沒有甚麼統計數字可作依據，要準確地預測學生人數而聘請足夠的教職員工，殊不容易，我自己是教書出身的，許多事情都要靠學生做跑腿。

「我最慶幸的，是首先請到了一位很聰明，很有判斷力的陳振名校長，他是華德小學第一任校長，他不但是個積極進取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天生的領袖，每事親力親為，又是個熱心教友。他的精神，他的幹勁，到現在仍然感染著華德學校每一位師生。許多年來，華德之所以仍在名校之列，我覺得陳校長功勞很大。

「當時各教會爲了應付難民的緊急救濟工作，把重點放在糧食和醫療服務上，教育辦學方面，沒有資料可以根據，陳振名校長卻認爲首先要確實知道學生人數，其他一切就好辦了。他主張要先招生，結果成績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頭一天就有數千名家長排隊報名，索取表格，要勞動大批警員維持秩序。

「結果在1963年華德小學創校時，上下午各有二十班，新生高達一千七百多人。第二年擴展到四十八班，人數就超過二千了。而且除了本區學生外，更有從港島及新界各區前來上學的。」

華德學校(Bishop Walsh School)是爲了紀念華理柱主教在中國江門傳教的功績，1975年起轉由天主教香港教區管理。位於延文禮士道39號(Inverness Road, Kowloon)的新校舍於2010年正式落成啓用，同時正式

轉為全日制學校，又易名為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Kowloon Tong Bishop Walsh Catholic School)。

(五) 瑪利諾修會因應時代需要

任澤民神父成功創辦了華德學校之後，在教育及牧民工作上就更有信心，樂趣大增了。任神父繼續說：

「我在華德學校做了七年校監，其間返過美國兩次，後來會長派我去觀塘聖若翰堂(1962年成立)，做第二任本堂神父，負責觀塘、秀茂坪、藍田、翠屏道等地區的教友牧民工作。

「1968年，我開始策劃興建觀塘瑪利諾書院，由於早前已經有著創辦華德學校的經驗和成績，在聘請老師、招生、請承建商、標投建築公司等各方面，都駕輕就熟，比上一次輕鬆得多了。

「瑪利諾書院是一所全日制男子英文中學，在1971年成立，1982年開始轉移交給香港天主教教區管理。

「我覺得無論華德學校或瑪利諾書院，我都幸運地請到很高質素的教師，使學生的學業成績及課外活動達到一流水平，成為香港的優質學校。



「1969那一年，瑪利諾修會在經濟上處於穩定狀況，總會決定將餘款捐助香港教區，作為籌辦及發展牧民中心之用，於是在翠屏道100號的一幅私家地興建了一座牧民中心，裡面附設一間註冊聖堂，可以舉行講座、辦婚禮或喪禮儀式，同時供應附近幾個堂區使用。建築費接近六百萬，全部由瑪利諾修會負責，在當時來說實在非常昂貴。這種牧民中心，在香港天主教教區是一個創新的概念，但事實證明，正正切合了教區針對社會勞工階層，在傳道、牧民及服務上適應社區的需要，以後更在其他地區和澳門等地發展。

「1976至77年，瑪利諾總修會因應時代需要，著令所有瑪利諾神父歸屬香港主教名下，並且將瑪利諾修會建立的堂區，全數移交教區管理。」

(六) 也許我永遠也不會明白



「許多年來，華德之所以仍在名校之列，我覺得陳校長的功勞很大。」任澤民神父口邊從沒有停過感恩。

訪問到這裡，我心裡有點好奇：

1959年到70年代，正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前後，香港和全球教會都出現一種新面貌，大公會議

鼓勵教友離開自己的小圈子，放眼世界上不同需要的人。這種突破傳統的思想，開展了數之不盡的救恩途徑和事奉上主的方式，釀成了很多年輕人寧願放棄高官厚祿，獻身為基層社會的工人和貧民服務，卻也影響了一些神職人員離開崗位，去追隨個人認為更崇高的理想。

許多外國神父到了香港，一方面要適應新文化，另一方面要學習新語言，在各種環境挑戰下，會很容易放棄聖召而還俗。

我問任澤民神父有沒有想過還俗？

「我非常幸運，入修院那一年，聖召很蓬勃，我班裡有五十多個修生，三十九人都升了神父，我們常常有聯絡，我到香港的時候，見到很多很熱心和積極的，不同修會的神父和修女，大家都互相幫助和鼓勵。希望你和我的想法一樣，都相信聖神在教會內的德能！」

任神父突然沉默了一陣，帶著寧靜慈祥的目光凝視著我，我低頭反省。

神父繼續說下去：

「我也相信，聖神不斷在更新和推動教會，在聖神的指引下，一切都很自然地發生，大公會議讓教會

有機會向全球展示了這種聖神的德能和活力。

「瑪利諾修會的會章沒有規定會士必須發甚麼甚麼願，只有一個承諾(promise)：就是服從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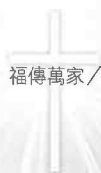
「許多人會覺得聽命是一種束縛，但在我來說，服從卻是極度的自由，很多時候，只有長上知道一件事情的前因後果，我對一件事或一項任命的真相可能全不知情，也許永遠我也不會明白，對我來說，這正是一種恩典(grace)。

「豈不是嗎？一個人能夠無憂無慮，全情投入，努力為天主做好一件長上委派你做的工作，這豈不是一種福氣嗎？

「我很幸運，從開始就覺得，加入瑪利諾修會的傳教工作很適合我。

對於我的司鐸聖召，我時刻感謝天主，有我的家人不斷的犧牲和支持，有修會和教區長上對我毫不保留的信任，有我身邊一起工作的神職人員和教友的支持，有每天在職責上帶來的新經驗，這些都是值得每天珍惜的。」

任神父口邊從沒有停過感恩。



(七) 我從沒有刻意要求過甚麼

聽任澤民神父談自己的聖召，似乎不但沒有遇過甚麼挫折，反而平步青雲。是真的嗎？

「回顧自己從1949年入修院到現在，我當時十七歲，到現在八十一歲，六十多年的聖召生涯之中，我從來沒有刻意要求過甚麼甚麼，或者選擇做這做那，我擔任過許多不同職位，服務過許多不同堂區，無論大小工作，都是由會長衡量教會的需要，根據個人的經驗、年齡和特長來分配，而不是基於個人喜好的。有了這種心態，就自然會歡欣期待，因為每份新的任務，都能夠在舊有的經驗上紮根，把以前的東西活學活用。每項新的挑戰，都在我眼前展開一段新的里程，擴張一個新的視野，所以我從沒有刻板沉悶的時候，相反，我每天都過著多姿多采的生活。

「舉個例子，我曾經兩次被推選連任瑪利諾會總會長(1974 -1986)，每次任期六年，後來也被派到美國紐約總會工作了兩、三年。在美國時我感到最大的挑戰，是互聯網中心系統常常出現故障，會院裡面有

三、四十位職員，分別隸屬許多不同的單位，一時很難找出故障的源頭，而我的背境和經驗是在行政方面的，對電腦一竅不通。過了不久，我漸漸明白中心系統的故障問題，其實是員工之間的人事關係，而不是電腦構成的，所以我從處理人力資源著手，很快事態就平伏下來。後來會院找到一位電腦專家神父做中心主任後，我就要求返回香港堂區工作。

「我在美國母院，過了一段非常忙碌而有意義的日子，修院離開我家鄉，僅僅兩個小時的火車路程，在週末，我可以回家探望父母及家人，在這段時間內，我陪伴爸爸走了人生最後一程，也見證了我妹妹的婚禮。」

(八) 參與聖神研究中心行政工作

任澤民神父在美國紐約工作的時候，曾經兩次連任瑪利諾會總會長(1974-1986)，任期共十二年之久，其中有三年又被派到總會做行政工作，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離別香港這麼多年，任神父居然又再次要求返回香港教區服務。

「1987年，我從美國瑪利諾總會院回到香港，再次投入教區服務。在離開香港十五年期間，我做的都是行政工作，無論書信來往，日常溝通，都用英文，我的中文開始變得生硬，所以決定重新在廣東話上下些功夫，當時橫頭磡聖博德堂仍由瑪利諾修會管理，剛巧有個空置著的房間，白禮賢神父(Rev. Anthony V. Brennan, M.M.)遂邀請我擔任助理司鐸。首六個月，開彌撒還可以用羅馬拼音，但宣讀福音、講道理，則感到很吃力。

「1988年，湯漢神父(Rev. John Tong Hon)來了一封信，邀請我協助聖神研究中心(Holy Spirit Study Centre)的行政工作。湯漢在1980年被胡振中樞機(Cardinal J.B.

Wu Cheng-Chung 1975-2002在任)委任，在香港仔聖神修院內創辦研究中心，專門協助教區觀察、搜集、研討和分析有關中國教會的資料，加深香港教區對中國及中國教會的認識和關懷，並期望對中國不斷轉變的情況，作適當有效的回應。

「我以前一向的工作，都集中在處理行政事務方面，所以我請示了會長後，便欣然接納了這份兼職，現在每星期二、三、四，在聖神研究中心上班，其他日子則回到橫頭磡堂區工作，如今湯樞機的職責越來越繁重，所以我的工作也逐漸增加，我主要是負責財政和外務，一切書信文件，都用英文。」



（九）見證了香港的成長

從1959年，任澤民神父初抵香港時算起，到今天為止，任神父在香港傳教超過了大半生，他到底有甚麼感想？

「平淡無奇的日子過得特別快，就這樣，回到香港轉眼又是二十五年，四周的建築、街道、商場，變化很大，人事調動更多，聖博德堂區已經歷過五位神父，而我僥倖地依然平安健康，享受我的生活，目前我最得意的工作，是我回來時在這堂區創立了主日學。

「感謝天主聖神的帶領，雖然每天都有不同的困難和挑戰，但我眼見著一代又一代的教友成長，也見證了香港一天一天的繁榮，從木屋區搬到三層徙置區，從三層徙置區搬到七層大廈，從七層大廈搬到政府廉租屋邨，之後又拆又搬，大廈越建越高，商場越建越大，而香港則人口越來越擠迫。香港變得國際化、城市化，很可惜，神父上門探訪教友的機會卻越來越少了。

「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反而簡化了牧民的工作。記得有一年在觀塘聖若翰堂，領洗的新教友就有一千多人，但要知道，開學校、辦牧民中心，只不過是一個堂區牧民計劃的橋樑，最重要的，是可以不斷培訓大批的牧民工作人員，提供有質素的福傳和跟進服務，這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這些慕道者來說，時間越急越重要，不能耽誤太久，一般學道理六至八個月便可以領洗，所以有一種急切性。有一段時間，堂區有數十位道理班教師、七位神父，日以繼夜的工作，牧民工作欣欣向榮，前景樂觀，我感到十分欣慰。」

正當我專注地聽著任澤民神父說出他在香港50年難忘的故事時，下課的鈴聲突然響起來，原來我們一談就已經是兩個半小時，很多孩子放學時特意跑到門外，跟神父揮手道別，他也趁機會站起來，轉過身子在書架上找到一本《澤心民語》遞給我：

「這是五、六年前，橫頭磡一班教友為紀念我升神父50週年出版的，我餘下的就只有這一冊了，你拿去吧！」我連忙向他道謝。

翻翻書的背後，上面印著任神父的感言：

「有時生活之路看似十分漫長，十字架看來十分

沉重；但有時又陽光燦爛，路途變得平坦，十字架也顯得輕盈。我用了四十五年才明白這份奧秘，我需要另外四十五年才可以完全活出這份奧秘來。」

對今年八十三歲高齡的任澤民神父來說，這是生活的奧秘，對我們一般人來說，這是超凡入聖的謙卑和智慧。

註釋

- 註一：聖博德天主堂及小學於1963年成立，一直由瑪利諾修會神父管理，當時專為慈雲山、黃大仙、橫頭磡和老虎岩的居民服務。時至今日，除了橫頭磡之外，還包括樂富、天馬苑、天宏苑、翠竹花園、鵬程苑、富強苑、德強苑、嘉強苑、康強苑和美東村等。
- 註二：《天主教教理》給我們清楚解釋，「凡是不認識基督福音和祂教會的人，只要按照他們曉得的，尋求真理並承行天主的旨意，都能得救。聖神給眾人提供參加逾越奧蹟的可能性，其方式只有天主知道。」(GS22-5)
- 註三：《澤心民語》(“In His Own Words” by Fr. John A. Cioppa, M.M.)聖博德堂出版。2009年5月。
- 註四：《The New York Times》“Bishop James E. Walsh Dies; Missionary Jailed by Chinese, Obituaries by Josh Barbanel” - Published: July 30, 1981。2015年5月25日下載。
- 註五：《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Address of the Holy Father Paul VI to Bishop James Edward Walsh, Missionary in China, Imprisoned in Shanghai for Eleven Years.” November 3, 1972。原文從簡。2015年5月25日下載。
- 註六：《Sunday Examiner》“Death of Father W. Mulcahy, M.M. - Former Local Superior of Maryknoll R.I.P.” November 3, 1972。2013年11月20日下載。